

# 实践的关系唯物主义

## 作者简介：

姓名：张皓翔

单位：河南省南阳市第五完全学校高中部

邮箱：nyzhanghaoxiang@outlook.com

ORCID: 0009-0001-2997-7726

**【摘要】：**在通行的教科书与理论叙事中，“物质决定意识”被广泛视为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经典命题。然而，马克思与恩格斯本人从未提出这一论断。本文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的重新考察，指出这一教条偏离了马克思“生活决定意识”的原初表述，并将唯物主义退回到了前康德式的、机械实体论的旧唯物主义之中。为清除这一理论迷雾，本文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做出如下概括：不是用物质或意识作为本原来回答“谁决定谁”，而是揭示“物质与意识”这对范畴只有在实践之中才能获得具体的规定与关联；脱离实践，二者既无法比较，也无法构成真正的因果关系。基于这一方法论立场，本文提出一种以“实践”为第一本体的关系唯物主义重构，其核心命题是：在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物的（生产性）关系，决定了在同一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性关系。在这一重构中，实践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直接决定了“物的（生产性）关系”（即劳动力要素化的历史形态），而物的（生产性）关系则凭借其对人类作为生物体之肉身生存权的绝对统摄，直接决定了“观念性关系”。本文进一步揭示了这一决定链条的内在机制——实践对观念性关系的决定是间接的，必须经由物的（生产性）关系这一历史中介。在此基础上，本文辨析了观念性关系作为“一从”在实践内部对物的（生产性）关系所进行的辩证调节与反作用，并在继承列宁“物质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分层学说的同时，批判了后世教条主义所造成的“共时性断裂”。最后，本文通过与日本关系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广松涉的理论对话，划定了本重构的理论红线：关系必须以实践为母体，绝不能滑向“去实践化”的结构主义玄学。

**【关键词】：**关系唯物主义；实践；物的（生产性）关系；观念性关系；劳动力要素化；广松涉；生活决定意识

## 一：文献综述：

本文的理论重构，在思想史上与以下经典文本及路径构成对话关系。

第一，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原始论述。本文的出发点，是对通行教科书“物质决定意识”命题的批判。回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与恩格斯明确写道：“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这里的“实际生活过程”不是物理过程，而是人类通过劳动改造世界的实践展开。同样，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秘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错误地、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这些文本构成了本文理论重构的原始地基。

第二，列宁的社会关系分层学说。在《什么是“人民之友”》等著作中，列宁确立了“物

质的社会关系”与“思想的社会关系”的二分法，为社会科学奠定了客观基石。这是本文的直接理论来源。然而，后世教条主义将列宁论战性的功能二分法僵化为实体性的“两个世界”，造成了“共时性断裂”。本文的任务之一，就是用“实践”这一总体性概念重新缝合这一断裂。

第三，日本关系主义马克思主义（广松涉）。广松涉在《唯物史观的原像》中深刻指出，教科书体系是用近代机械主义的“物的世界观”扭曲了马克思，并率先将“关系”引入唯物史观重构。他正确地看到，马克思对“何为本原”问题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超越。但本文认为，广松涉的重构抽离了“实践”这一能动内核，将“关系”拔高为脱离感性物质始基的先验结构，最终滑向了去实践化的结构主义玄学。

在上述三条路径的交汇处，本文提出一种以“实践”为第一本体的关系唯物主义。核心命题是：在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物的生产性关系，决定了在同一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性关系。其中，物的生产性关系的核心是劳动力的具体形态（劳动力要素化），而物的生产性关系则是实践实现对观念性关系之决定的必要历史中介。

## 二：引言

“物质决定意识”——在中国，任何一个接受过基础哲学教育的人都能脱口而出这句话，并坚信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基石。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从未说过这句话。

这不是细枝末节的考据。当教条主义用“物质”这个抽象的物理学范畴替换掉马克思所说的“实际生活过程”时，唯物主义便退回到了马克思曾竭力批判的旧唯物主义之中。在那里，物质与意识被当作两个独立的实体，前者像台球碰撞一样单向地决定后者；而人类最根本的活动——实践——被彻底抹去了。

本文的任务不是概念辨析，而是正本清源。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可以概括为：不是用物质或意识作为本原来回答“谁决定谁”，而是揭示这对范畴只有在实践之中才能获得具体的规定与关联；脱离实践，二者既无法比较，也无法构成真正的因果关系。

基于此，本文提出并辩护的核心命题是：在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物的生产性关系”，决定了在同一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性关系”。这套物的关系之所以具有决定力量，是因为它凭借对人类肉身生存权的统摄，从肉体和社会双重维度上格式化了人的生命轨迹。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节批判“物质决定意识”教条，确立实践的第一本体地位；第二节分析决定机制——物的生产性关系如何通过劳动力要素化获得统摄意识的力量；第三节讨论观念性关系的辩证反作用；第四节在思想史对话中划定理论边界——继承列宁、批判教条主义、与广松涉划清红线。

## 三：正文

### 第一节 物质决定意识的批判

在通行的哲学教科书与常识化的理论叙事中，我们早已习惯将唯物主义的基石确立在某特定的公式之上。“物质决定意识”被广泛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经典论断。但问题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从未说过这句话。他们的原句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sup>[1]</sup>

当我们重新打开《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文本，会发现这一近乎“常识”的偏离，并非

细枝末节的字句出入，而是关乎整个哲学范式方向的根本性错位。传统教科书体系所标榜的“物质决定意识”，在长期的教条化传播中，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前康德式的、朴素且僵硬的“实体对实体”的因果关系。在这种语境下，“物质”被还原为脱离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客观存在的物理实体，而“意识”则沦为被动反射这一物理实体的精神镜像。

然而，马克思所使用的“生活”（Leben）和“存在”（Sein），其德语语境具有极强的实践指向。马克思所说的是：“意识（Bewuss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bewuss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wirklicher Lebensprozess）。”【1】这里的“实际生活过程”绝非一个纯粹的自然生理学或物理学过程，而是人类通过劳动主动重构客观世界的历史性展开。当教条主义用“物质”这个抽象的物理学范畴替换掉“实际生活过程”这一活生生的实践范畴时，唯物主义便悄然退回到了马克思曾极力批判的旧唯物主义（如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之中。

而在马克思主义之中，正是重视一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作为历史的、具体的处理，与不同生产与交换形式之中的主体来进行考察的。因此，人的生活绝非可以与其他生物的生命活动等量齐观的一种物质运动过程，而是一种生产性关系的具体展开。我们必须看到，动物的生命活动仅仅是对自然环境的消极适应，它们的“存在”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物质运动。但人类不同：人类通过生产劳动不仅改变了自然，更在这一过程中结成了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中所指出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这种生活，不是细胞的分裂与物理能量的守恒，而是在特定的“生产与交换形式”中，由具体的历史主体共同编织和维持的社会网络。它是“生产性关系”的能动展开。

简单地说，“物质决定意识”这一命题实际上是将马克思本人的理论观点转化为一种脱离了人的世界的物理实体对精神实体的机械因果决定。它在一方面将马克思本人最重视的生活展开即实践给消解掉了，另一方面将本身处于辩证中的关系性命题简化为了一种因果性公式。这种“因果性公式”是笛卡尔式二元论（心物二分）在唯物主义外衣下的还魂。在旧命题的机械决定论下，物质和意识被当作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物质在左，意识在右，前者像台球碰撞一般单向地、机械地决定后者。在这个粗暴的决定链条中，人类最根本的本体论活动——“实践”被彻底抹去了。没有了实践这一中介，人类便无法通过改造外部世界来生成自身的意识，意识也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或者只能退化为生理大脑对物理刺激的被动反应。这是一种深刻的理论退步。

为了彻底廓清这一迷雾，我们必须追问：那么马克思本人书中的“生活决定意识”究竟是什么意思？让我们顺着马克思本人未充分展开的方向进一步讨论一下。这里只是在强调：人在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所结成的物的（生产性）关系，决定着人在同一实践活动中所生成的观念性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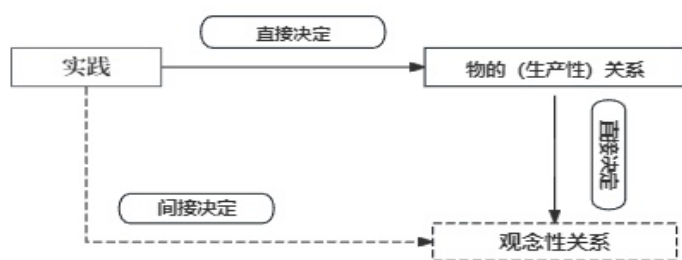
为了彻底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深入到哲学的本原问题之中。进一步讲，马克思本人实质上对传统哲学“何为本原”这一根本性问题进行了一场极为漂亮的釜底抽薪式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单纯讨论物质与意识本质上是空洞的、错位的。意识并不产生于物质，而产生于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之中；物质同样也只有参与到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中，方能与意识结成关系。因此，单纯抽象地讨论一个自然界已经存在的物质与人类在实践过程中才能产生的意识，本质是一场不对等、不可化约的两个东西的生拉硬凑。我们不应该空洞地谈论天然存在的物质与只有在人类实践过程中才能形成的意识，而应将它们放在同一领域之中。这一领域，就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

传统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围绕着“物质与意识谁是第一性”展开了长达数个世纪的拉锯战。但这场争论本身就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前提之上。它们共同默认了“自然界已经存在的天然物质”与“人类的意识”可以直接在同一个本体论平台上对话。然而，这是一种范畴的错

位。自在的自然物质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存在，遵循的是无目的、无意识的物理与化学规律，它是不可化约的客观实在；而人类的意识不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实体，它天然地带有社会性、历史性与语言性。把这两个完全不对等、不可化约的概念生拉硬凑在一起，试图用前者直接推导和决定后者，必然会导致理论的僵死。意识怎么可能直接从一块万古不变的石头、或者一团虚无的星云中自发产生？它必须经过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只有当外部的物质被引入到人类的劳动工具中、被转化为生产资料、被纳入到社会的劳作过程时，它才褪去了其纯粹自然的、不可沟通的“自在之物”状态，变为了“为我之物”。也只有在这一时刻，物质才与人类的意识结成了真正的、具体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关系。因此，脱离了实践，空谈“物质决定意识”不过是抽象的玄学；唯有在实践的平台之上，我们才能看到关系的交织。

因此才有了“生活决定意识”，而非“物质决定意识”。因为马克思要强调的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永恒存在的物质与只有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才能形成的意识之间的关系，他始终强调的都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一体两面的生活与意识之间的关系。“生活决定意识”，强调的是可化约的同一性内部的关系互动。而后者讨论的则是本身就不对等、不可化约的两个抽象概念之间的虚假关系。“生活决定意识”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生活”与“意识”在实践活动中具有一种可化约的同一性：它们不是两个并立的、异质的、无法跨越鸿沟的实体，而是同一实践过程内部“一主一从”的两重关系的精确表达。“生活”是人在改造世界中具体的、生产性的活动，而“意识”则是从这同一实践中生长出来的理解方式、话语逻辑和观念结构。当你处于某种特定的生产资料分配与劳动分工之中时，这种实际的、物的生产关系，便从根本上统摄了你如何想象世界、如何建构日常生活的意义。因为你必须在这一关系中生存，你的大脑、你的思维方式必须与你的生产方式相匹配。相反，“物质决定意识”所探讨的，则是“天然物质”与“意识”这两个本身就不等价、不可化约的抽象概念之间的虚假关系。它将活生生的、同一实践过程中的双重关系互动，强行退化成了两个物理孤岛之间的机械因果。因此，生活与意识的本原是实践。而只有在实践这一大框架之中，我们才可以说生活是意识的本原。我们只有在承认“实践”作为第一本体的前提下，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生活决定意识”。因为是实践创造了生活的舞台，同时也在舞台上孕育了意识的灯火。

为了将这一关系彻底清晰化，我们必须将其重构为一种动态的、双重的决定机制。具体地讲，生产性关系与观念性关系都是由实践决定的。只不过前者是实践直接决定，后者是实践通过先决定物的（生产性）关系、再通过物的（生产性）关系直接决定观念性关系来间接决定的，从而形成一种间接的决定机制。



## 第二节 历史中介与物化机制

在我们确立了生活决定意识的真正逻辑关系后，即在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

的物的（生产性）关系决定着在同一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性关系。这种关系的重构，使我们得以摆脱传统教科书将“物质”与“意识”生拉硬凑在同一本体论平台上的尴尬，转而在“实际生活过程”这一活生生的实践地平线上重新审视整个世界的本原。然而，理论的彻底性不容许我们止步于宏观命题的宣告。如果我们仅仅指认了“物的（生产性）关系决定观念性关系”，而无法指明这一决定的传导路径与作用机制，那么这一决定论就依然面临着沦为抽象教条、乃至退回旧唯物主义机械决定论的危险。

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去讨论和解决这一决定的具体机制是什么？

要弄清这一决定关系的实现机制，我们就必须先明确生产性关系的核心是什么。它实际上就是劳动力的具体形态，以及生产关系中劳动力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

劳动力绝非一成不变的抽象物理能量，在不同的历史地平线上，它总是以极其具体、感性且带有历史规定性的形态参与到生产实践之中。在已有的人类文明史中，劳动力形态的共性是要素化。劳动力的要素化，是指劳动力从人作为完整生命活动的存在中被强行剥离、指认、衡量、安排并占有，从而退化为社会大生产机器中一个可被计算和调配的客观生产要素。这一“要素化”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着人类生产力工具的变迁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在整部人类文明通史中经历了五种典型的历史形态演变：

原始社会晚期的混沌与初步分离形态：在原始社会早期，劳动力完全溶解在以血缘为纽带的生命繁衍与种群存续活动中，处于“鱼不知在水中”的完全混沌状态。直至原始社会中后期，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和三次社会大分工的推进，劳动能力才第一次在交换的镜子里被辨识出来，迈出了脱离劳动者生命本体、走向初步分离的第一步。

奴隶社会的资源化形态：在奴隶社会，劳动力的要素化完成了它的第一个制度形态——资源化。在奴隶主的冰冷账目中，奴隶的劳动力被定义为与矿产、土地、牲畜同质的、天然存在的客观资源。奴隶主通过对奴隶身体的直接人身占有，达成了对这一活体资源的绝对开发、支配与计算，使劳动力沦为“会说话的工具”。

封建社会的土地依附形态：封建社会引入了“土地”这一关键的中介，将直接的人身占有转化为以土地为中介的间接支配。农民在法律或事实上被束缚在领主的土地之上，地主阶级通过垄断土地这一核心生产资料，以地租（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的形式间接支配并榨取农民的剩余劳动，劳动力呈现出依附性弱化但依然固着的特征。【7】

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化形态：工业革命与工厂制度彻底摧毁了封建依附关系的锁链，将劳动者“解放”为一无所有的“自由人”【3】。劳动力要素化在此完成了其最纯粹的历史跨越——商品化。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被普遍买卖，劳动者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和形式上的自由，但在实质上，其生存权被彻底锁定在出卖劳动力以换取工资的资本增殖轨道之中。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全景殖民形态：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景观中，资本凭借算法、数据和平台等虚拟生产资料，使劳动力商品化发生了“点——线——面”的全面铺开与升维。资本的支配逻辑突破了工厂围墙和工作时间的物理边界，将触角伸向劳动力再生产的全生命周期。教育被重新定义为人力资本投资，闲暇被算法捕获为无酬的数据生产，劳动力的生产、安排与消费环节被系统性地编程、监控与榨取。

这一劳动力形态从“混沌”到“资源化”，再经“土地绑定”到“全面商品化”的历史轨迹，在本质上呈现出一条使劳动者与自身劳动能力不断异化、剥离的物化锁链。正是劳动力的这种“要素化”共性【7】，构成了我们在文明史上所能观察到的所有物的（生产性）关系的基础。

值得我们以最深刻的批判眼光去凝视的是：这实际上是对物本身/商品拜物教（Fetishism）的进一步推进。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将“商品拜物教”的视野限定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之下，揭示了在商品生产普遍化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如何被物与物的关系所遮蔽的【4】。然而，当我们站在“劳动力要素化”的历史高度，将这一视线从资本主义社会推向整个人类文明史时，我们会发现，拜物教的逻辑其实早已贯穿了整部压迫史。

从奴隶社会的“人即资源”，到封建社会的“力依于地”，再到工业与数字时代的“劳动力即商品”，人类文明在本质上一直运行在一套“要素拜物教”的编码之中。正是因为劳动力在已有的历史中始终被视为当做一种要素被对待，被安排、被组织，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了一种由物的（生产性）关系决定的，而非人的本质性关系所决定的。在这一物化机制的统摄下，人与人之间原本应当作为完整主体展开的、充满温情、创造性与生命自主权的本质性关系，被彻底矮化并重构为了要素与要素、投入与产出、支配与被支配的物的关系。

那么，为什么这套冰冷的物的（生产性）关系能够具有如此强大的、几乎不可抗拒的统治力量，从而能够直接决定人的观念性关系？这一决定机制在肉体与社会层面上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而这一决定机制的实现是因为人首先是一个生物体，其次才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经济体。

这是我们进行唯物主义建构时不可动摇的存在论前提。人不是纯粹理性的精神幽灵，也不是生来就带有社会关系的抽象经济符号。作为一个具有肉体存在的活人，人首先必须作为一头生物学意义上的野兽而存活。他需要呼吸，需要果腹，需要抵御寒冷，需要维持细胞的代谢与机体的热量守恒。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必然性，构成了人类一切活动最底层的、无法被任意修改的硬约束代码。只有在生物体的肉身存活的前提下，人作为经济体、社会体和文化体的历史性展开才有可能获得物质基础。

而随着人类形成社会形成分工，人作为生物体需要的基本资料必须经社会实践中的物的生产性活动而实现。

在孤立的荒野中，单个人为了维持生物体存活而展开的活动仅仅是动物性的消极适应。但是，当人类结成社会、发展出分工，生存的算式就发生了质的跃迁。个人不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获取全部的生存资料。你所吃到的粮食、你所穿上的衣服、你所居住的房屋，都不能再仅仅依靠个体的本能索取，而是必须通过社会化分工网络中庞大的、有组织的物的生产性活动——即人类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来予以生产和交换。

于是人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经济体，更是作为一个生物体都不得不依赖于物的生产性活动。

当一个人的肉身存活（生物体）与他在社会分工中所处的生产资料占有和劳动分工位置（经济体）被牢牢绑定在一起时，这种依赖就获得了一种绝对的、带有生死存亡性质的强迫力量。你想要活下去（生物体的基本诉求），就必须在特定的生产性关系中占据一个位置——无论这个位置是奴隶、佃农、雇工还是外卖骑手。你必须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一种“要素”贡献给这套物的生产系统，接受它的测量、它的安排、它的调度与它的剥削。在这一刻，你如何生产性地改造世界、你用什么工具、你被分配到什么样的工序上、你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面前处于何种依附地位，这一切实际的“物的关系”，便从肉体和社会的双重维度上，以最无可置疑的坚硬度强行规范了你的生命轨迹。

这也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错误并颠倒的表现物与物的社会性关系【4】。

由于每个人都必须依赖于这套物的生产性活动来解决自己作为生物体的生存问题，人们在共同劳动、共同改造世界中所结成的、本应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之间主体对主体的社会关系，便在现实的交换与分配中，被这套要素化的体系格式化了。人与人之间生动的、本质性的关联隐退了，取而代之的是商品与商品、资金与资金、劳动力要素与资本所有权之间的冷酷对价。社会关系被错误地、颠倒地赋予了物的形式。在这种物化机制中，你不再是一个有尊严的、拥有自由意志的活人，而是成为了“一小时的劳动力”、“一个算法框架下的账号”、“一份需要支付的地租”或“一笔需要回收的信贷”。物的（生产性）关系，像一张无形却坚硬的电网，将所有人的生活际遇与思维边界牢牢地统摄在内。

于是，这个人在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观念性关系便必须由此直接决定。

你如何想象世界、如何建构日常生活的意义、在头脑中形成何种道德观念与意识形态，

并不是你的大脑在真空中的自由创作。当你必须为了肉身存活而在特定的、物化的生产性关系中生存时，你的大脑、你的思维方式、你对世界和自我的全部观念，都必须与你的生产方式和生存位置相匹配。处于物的奴役关系中的奴隶，必然会形成关于“主仆天命”或“肉体逃亡”的观念性关系；被地租和土地牢牢绑定的佃农，必然会生成以“收成、天意、伦理依附”为内核的思维结构；而在数字资本中被算法精准调度的打工人，则必然会在其观念性关系中灌注“绩效、内卷、焦虑与系统性被安排感”。观念性关系是由物的（生产性）关系所直接拉出的镜像与延伸，它在物的（生产性）关系所划定的界限之内运行，并随着后者的调整而发生相应的平移。

在这里，我们最终完成了对这一决定机制的双重维度重构：而且实质仍是由实践决定的，不过实践对他的决定是间接的，是依托于物的（生产性）关系的直接决定而实现的。

实践——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本体论活动——始终是整个世界和人类历史的第一本原。但是，实践并不以一种神秘的、直接的灵光闪现去凭空格式化人的意识。实践在运动中分裂出两个环节、两重关系。实践首先直接决定了物的（生产性）关系。人在实践中改进工具、深化分工、形成劳动力要素化的历史形态，从而在物质生产领域结成坚硬的、物化的生产网络。然后，这一由实践直接决定的物的（生产性）关系，再凭借其统摄人作为生物体生存权的绝对强制力，直接决定了人在同一实践中所生成的观念性关系。

这是一种精妙的、双重的传导与决定机制：

在这条链条中，实践对观念性关系的决定是间接的。它不走空洞的、玄学式的精神因果路线，而是将自己的力量物化、凝聚为坚硬的“物的（生产性）关系”，借由这一历史中介的直接决定，来完成对人类意识和观念世界的重塑。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链条彻底活了起来。它既保留了实践作为第一本体的至高地位，又指明了生产性关系作为物质中介的直接规训机制，从而彻底清除了教条主义将“物质决定意识”窄化为机械台球碰撞的幼稚谬误。

### 第三节 实践内部关系的辩证调节与反作用

当我们确立了“物的（生产性）关系直接决定观念性关系”这一历史中介传导机制后，唯物主义的因果链条便获得了坚实的物质硬度。然而，唯物辩证法决不承认任何单向的、线性的、机械的因果决定。如果物的（生产性）关系对观念性关系的决定是绝对单向且毫无回转余地的，那么人类在历史面前就将再度沦为消极、被动的机械傀儡，这无疑是向旧唯物主义宿命论的变相倒退。

因此，我们必须转入对这一关系链条的另一面——即所谓“反作用”——的深入讨论。要在“物的（生产性）关系”与“观念性的关系”这一由同一实践过程所孕育的内部关系网络中，去破译其辩证调节的奥秘。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观念性的关系会在人的实践过程中形成。意识不是外在于实践的旁观者，更不是物质生产完成之后才被动点燃的“余烬”。作为观念性关系的意识，在人类通过劳动主动重构客观世界的每一分、每一秒中，都已经是实践不可或缺的内在维度。人在挥舞石斧、开垦土地、操作算法的实际生活过程中，不仅在物性层面上重组了生产资料和分工（结成物的（生产性）关系），同时也必然在观念层面上重构了对劳动工具的理解、对合作者的体认、对劳动成果的想象与对生存意义的赋予（结成观念性的关系）。这两种关系不是两个在空间上分离的实体，而是同一实践活动在物性与观念维度上的双重展开。

正因为观念性的关系并不是对客观物理世界的消极摹写，而是直接参与、构筑实践过程的能动力量，它便必然携带着主体的能动意图。观念性的关系不仅是实践的产物，更是实践的导向。

这里必须做出一个根本性的理论澄清：当我们说物的（生产性）关系“决定”观念性关系时，这个“决定”绝不意味着观念性关系是物的（生产性）关系的附属品或附庸。恰恰相反，

观念性关系一旦从实践中生长出来，便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存在形态和运行逻辑。它有自己的结构、自己的惯性、自己的演化节奏——它既是从前者生长出来的，又不是前者的影子。这就如同树木从土壤中生长出来，但树木不是土壤的附庸；思想从大脑活动中产生，但思想不是大脑的附庸。生长出来的东西，一旦生成，便具有了独立的实体性。然而，这种独立性又是有限度的：观念性关系永远无法彻底脱离实践这一母体而独立存在，它始终与物的（生产性）关系统一于同一实践过程之中，并在此过程中与前者相互博弈、相互影响、相互塑造。这就是“决定”的真实含义：不是主仆式的派生，而是母体式的生成与独立后的共生。

在观念性关系的生成中，世界关于方法论，而世界观与方法论要在实践中可以指导实践的进行。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理论断定。“世界关于方法论”——世界观从来不是一种脱离行动、高高在上的“纯粹理论观照”或静态图景，世界观本质直接指向方法论，指向“人应当如何行动”的实践方案。当人在实践中形成关于世界的某种根本性理解（世界观）时，这种理解便立即在实践的硬约束下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准则与操作路径（方法论）。而世界观与方法论绝非悬浮于实践之上的精神神话，它们要在实践中可以指导实践的进行，就必须直接嵌入到物的生产性活动的每一个微观环节之中。

一个处于特定劳动力要素化形态中的劳动者，他关于劳动工具的知识、关于分工协作的默契、关于自身生存境遇的理解，共同构成了他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套世界观与方法论在实践中实时地指引着他如何挥舞工具、如何配合他人、如何应对生产过程中的突发阻碍。观念性的关系正是通过“世界观与方法论”这一中介，将自身的观念力量物化为具体的实践行为，从而反作用于物的（生产性）关系。

这种指导与反作用的发生，绝非两个异质领域之间的外部撞击，这实质上是同一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两重关系，是一主一从的统摄与辩证调节。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一辩证关系的“同一实践过程”前提。物的（生产性）关系与观念性的关系，是同一实践过程这个“活的总体”内部所生成的两重关系。在这一总体内部，物的（生产性）关系作为“一主”，在基础性层面上规定并统摄着观念性的关系这一“一从”；但作为“一从”的观念性关系，绝非消极的附庸，而是作为同一机体内部的辩证调节系统，反过来调节、修正和加固着物的（生产性）关系。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恰恰是因为它已经生长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存在——它有自己的能动性、自己的逻辑、自己的反作用方式——而不是始终停留在被决定的、被动反射的状态。

当物的（生产性）关系在实践中遭遇生产工具的更新、或是分工的冲突时，原本的生产平衡被打破，劳动者的生物体生存与经济体运转面临危机。此时，作为“一从”的观念性关系立即发生时代化响应——它形成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重新编码劳动者的行动逻辑，并在实践中指导劳动者去调整生产资料的分配、重组劳动的协作方式、乃至物化为新的社会制度与规则。通过这种实时的“辩证调节”，观念性的关系不断修复着生产性关系的裂缝，或是推动着生产性关系向着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发生更新。这绝不是僵硬的机械反作用，而是同一实践生命体内部一主一从、相互博弈斗争又相互纠偏的活的总体运动。

正是通过这种物的（生产性）关系的统摄，与观念性关系在实践中的辩证调节，从而在关系的基础性层面上维持了社会结构的动态统一性。社会结构绝不是一种静态的因果关系连成的整体，而是一个在实践活动中不断自我生产、自我调节的活的总体。如果物的决定是绝对单向的，社会结构就会因为缺乏内部调节而陷入刚性易碎的死局；如果观念的能动是脱离生产关系的，社会结构又会因为陷入唯心主义的虚空转而彻底瓦解。

唯有在“关系的基础性层面”——即在同一实践过程内部所生成的双重关系互动中，物的（生产性）关系用它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生存硬约束，规定了社会结构的基本骨架（主）；而观念性的关系则以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形式，在每一次实践的具体进行中，实时地调节、润滑、加固并更新着这个骨架（从）。一主一从、博弈斗争、动态调节，这不仅是“反作用”的唯

物辩证法本质，更是历史在实践的发展中得以不断更新、社会结构得以维持其动态统一性的根本奥秘。

#### 第四节 几种重构唯物主义的继承与批判

当我们彻底厘清了实践内部“物的（生产性）关系”对“观念性关系”的双重传导与辩证调节机制后，这一由实践统摄的“关系地平线”便获得了自我运转的理论圆融。然而，任何一种理论重构都不能是在真空中凭空搭建的空中楼阁，它必须在思想史的洪流中认清自身的血脉谱系，在承袭前人最深刻洞见的同时，对其历史局限与后世发生的理论退化进行彻底的批判。在唯物主义关系本体论的发展史上，列宁关于“社会关系”的学说无疑是一座高耸的理论里程碑。我们对唯物主义的重构，正是对列宁这一伟大洞见的直接继承，并在对其后世教科书化、教条化偏离的深刻批判中得以完成的。

要理解本书对唯物主义的重构，首先必须返回列宁在批判主观社会学时所确立的社会关系分层体系。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等经典著作中，列宁面对民粹派主观历史学说的挑战，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抽丝剥茧，确立了“物质的社会关系”与“思想的社会关系”这一经典的二分法体系。列宁指出，以往的社会学家之所以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是因为他们无法从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找出最根本的因果链条，而只能依靠主观的“意图”和“道德”来解释历史。列宁的伟大突破在于，他将“思想的社会关系”（如政治关系、法律关系、道德关系等）与“物质的社会关系”（主要是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明确地剥离开来。在这套分层体系中，列宁确立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判定标准：“思想的社会关系”在形成之前，必须经过人的意识，它是人们在特定意识、观念和意图的指引下自觉或不自觉结成的关系；而“物质的社会关系”则是“不通过人的意识而形成的”【5】——这意味着，人们在为了生存而进行物质生产和交换时，就像动物适应自然一样，是作为一种客观的必然性被抛入到特定的生产关系之中的，不论你是否意识到，你都已经处于某种特定的分工和所有权结构之内。列宁的这一分层体系，首次在人类思想史上为社会科学确立了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性”基石。他通过将“物质的社会关系”判定为第一性的、决定性的力量，而将“思想的社会关系”判定为被决定的、派生的力量，极其有力地捍卫了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统治地位。本书所阐述的“物的（生产性）关系”对“观念性关系”的决定机制，在逻辑起点上，正是对列宁这一物质/思想社会关系二分法及分层体系的直接继承。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最深刻的理论一旦被固化为无需思辩的“常识”，便往往走向其反面。列宁为了批判主观社会学而建立的这种“功能性、论战性”的二分法，在后世的苏联教科书体系以及通行的教条主义叙事中，被逐渐窄化、僵化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实体性分裂”。这种偏离，在理论上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共时性断裂”。所谓“共时性断裂”，是指在后世的教科书体系中，“物质的社会关系”（经济基础）与“思想的社会关系”（上层建筑）被当作了两个在空间上并存、在实体上相对独立的“两个世界”。在教条主义的画卷中，左边是一个由铁轨、齿轮、工厂和冰冷的劳动合同构成的“物质实体关系世界”，右边则是一个由法律条文、哲学思想、道德说教构成的“精神观念世界”。这两个世界被彻底实体化了，它们之间存在着绝对的时间先后秩序和空间边界。这种“共时性断裂”带来了双重的理论灾难：一方面，它将原本作为活生生整体的“社会有机体”割裂为两个互不隶属的物理版块，人成了在两个版块之间来回穿梭的“双重分裂主体”——在生产时是无情的肉体工具，在思考时是飘忽的精神幽灵。另一方面，这种实体化二分法在解释历史时，必然退回到机械的“因果台球碰撞论”。它无法解释：既然“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通过人的意识而形成的，那么充满着人的目的、方案、技术知识的“劳动实践”又是如何可能展开的？如果意识是彻底被动的、在时空上滞后于物质关系的“副产品”，那么革命的能动性、阶级意识的觉醒又如何可能同一时空中对物质关系发起致命的暴动？这种“共时性断裂”，切断了人与世界、物质与意识在“当下实践”中的血肉交融。它用空间上的并置和时间上的机械先后，取代了历史辩证法的动态生成。为了克

服这一后世教条主义带来的共时性断裂，我们必须将列宁那被僵化了的二分法，重新统摄、消解、融合进一个更高的、生生不息的总体性概念之中。

这一更高的、能够彻底缝合“共时性断裂”的统一性总体，正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在本书重构的关系唯物主义视阈中，“物的（生产性）关系”与“观念性关系”绝不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存在着宇宙本体论先后秩序的实体性层面的关系。它们绝不是“物质实体”与“精神实体”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机械延伸。相反，我们必须始终强调：物的（生产性）关系与观念性关系，在本体论上不存在谁比谁更具有“第一性”的问题。它们共享着同一个唯一的本原——实践。当我们把视线拉回那活生生的、正在进行着的“实际生活过程”（Wirklicher Lebensprozess）时，我们会发现，任何一次微小的劳动实践，都同时、不可分割地包含着“物”的维度与“观念”的维度：当奴隶在鞭笞下开垦农田时，他一方面在肉体上与土地、农具、监工结成了物的、不得不如此的生产性关系（劳动力要素的资源化支配）；但与此同时，他脑海中关于工具的使用方法、关于逃亡的绝望、关于神灵的祈祷，就已经在同一瞬间结成了观念性的关系。这两种关系是在同一实践活动中、在当下的共时性中同时生成的。它们是同一片树叶的正面与反面，是同一股实践洪流在物性层面与符号观念层面拉出的双重波纹。因此，空洞地争论“物的（生产性）关系”和“观念性关系”谁是本体论上的“第一性”，本质上是对实践这一总体性源泉的背叛。如果脱离了实践，将物的（生产性）关系孤立地宣布为绝对的第一性，唯物主义就会立即退回费尔巴哈式的、直观的旧唯物主义，把社会关系还原为物理的、生物学的刚性死物；而如果孤立地宣布观念性关系具有超越生产关系的能动性，就会瞬间滑向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把历史视作绝对精神的自我游戏。只有承认两者的本原都是“实践”，在这一绝对的大前提成立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在关系的基始性层面，重新恢复社会有机体的活泼生命力。它们不是两个实体的因果碰撞，而是实践这一主体活动在自我展开、自我确立过程中，为了自我维持和自我调节而分裂、衍生出的两个内在维度。

既然物的（生产性）关系与观念性关系共享着实践这一本原，在本体论上不存在第一性的高下之分，那么，我们为什么在本书的体系中，依然理直气壮地坚持并宣称“物的（生产性）关系决定观念性关系”？这一“决定”的科学性与合法性究竟立足于何处？这绝不是对“第一性”教条的妥协，而是由实践对观念性关系决定的间接性与中介性机制所决定的。我们必须看到，实践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本体活动，它对意识和观念的决定，绝不是一种超自然的、灵光闪现式的“神示直接印刻”。实践不是一个飘忽在半空中的神灵，能够绕过物质世界，直接将“观念”吹入人类的大脑。人类的大脑是肉质的，人类的意识是高度依赖生存必然性的。因此，实践无法对观念性关系进行直接的决定。实践要塑造人的观念，就必须借助于一条物质化的、坚硬的历史中介。这个中介，就是人在实践活动中首先结成的、作为肉体存活（survival）约束的物的（生产性）关系。这一间接决定的逻辑传导链条是这样展开的：实践首先直接决定物的（生产性）关系——人在劳动中改良工具、深化分工、固化劳动力的要素化形态，这一过程是实践最直接、最感性、最客观的物化成果，它直接建立起了一套由工具、资源、分配和依附关系编织而成的、具有绝对强制力的“物的（生产性）关系”；然后，正如第二节所指出的，人首先是一个生物体，当物的（生产性）关系一旦建立，它便凭借其统摄人作为生物体生存权的绝对强迫力量，格式化了的每一个历史主体的生命轨迹——你要吃饭、要生存，就必须无条件地在这个物的网络中占据一个位置；最后，当你被牢牢焊接在这一特定的物的生产位置上时，你的大脑、你的话语逻辑、你对自我和世界的想象（观念性关系），便必须被这一物质位置所驯服和规训，观念性关系是在这一物质网络的挤压和规范下，作为其镜像与润滑剂被直接拉出来的。由此可见，“物的（生产性）关系决定观念性关系”这一命题之所以成立，并不是因为物的（生产性）关系在本体论上比观念性关系更古老、更根本（因为它们共享着实践这一本原），而是因为物的（生产性）关系是实践实现对观念性关系决定的必要环节，是无可替代的历史中介。

这一重构彻底驱散了笼罩在唯物主义头顶的形而上学迷雾。它告诉我们：物的（生产性）关系之所以具有决定性，是因为它是实践力量的“物化凝聚态”，是实践用来规训意识的“重力场”。我们之所以要研究生产关系、研究经济基础，是因为它是我们通往意识、通往观念世界那条唯一的、坚实的物质林荫道。通过这种“实践本原——物质中介——间接决定”的重构，我们不仅直接继承了列宁社会关系学说中最核心的唯物主义物质基石，更用“实践的统一性”彻底熔铸、缝合了后世由于形而上学实体化而导致的“共时性断裂”。唯物主义在这里不再是冰冷齿轮对精神的单向碾压，而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中，用自己亲手编织的物质生产网络，不断调配、塑造并更新自身精神家园的宏伟历史进程。

在完成了对教条主义实体决定论的清算，并确立了以“实践”为本原的间接决定论之后，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现代哲学重构唯物主义的另一条核心路径——以日本关系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理论重构。这一思潮以广松涉（Wataru Hiromatsu）为最杰出的代表。

广松涉在其重构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唯物史观的原像》中【6】，已经展现出极其敏锐的理论洞察力。他深刻地意识到，通行的哲学教科书和常识化的理论叙事，完全是在用一种近代机械主义的“物的世界观”（即实体本体论）去粗暴地扭曲和裁剪马克思的原始理论。广松涉指出，西方近代哲学自笛卡尔、霍布斯以来，始终陷入了一种“主客二分”与“实体主义”的怪圈：世界被还原为一个个孤立的、先于关系而存在的物理实体（“物”），而社会和历史则被视为这些实体之间发生偶然物理碰撞和机械相互作用的场所。在《唯物史观的原像》中，广松涉将“关系”作为一个极其核心的枢纽性概念引入唯物史观的重构【6】。他甚至已经认识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进行的哲学革命【1】【2】，绝非在“世界的本原究竟是物质还是意识”这一近代形而上学设定的陈旧命题中进行非此即彼的站队，而是对这一命题本身进行了彻底的超越。他指出，马克思是在用一种“关系的始基性”去解构近代机械论的、孤立的“物”的幻象，从而开启了超越“唯心-唯物”对立的历史地平线。

然而，广松涉的重构在将马克思从近代实体主义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的同时，却又悄然将理论拖入了另一个更为精致的深渊。其最根本的理论偏离在于：他仍然消解了马克思主义中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实践”。广松涉虽然高举“关系”的旗帜，却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误认为是一种“不存在先于关系的孤立实体”的纯粹关系本体论。在他的理论推演中，“关系”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不证自明的本体地位。由于抽离了“实践”这一最核心的能动内核，广松涉的关系主义最终退化为一种结构主义式的、静态的关系编织。

但正如我们前文所论证的，马克思固然在“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这一议题上进行了一次漂亮的、釜底抽薪式的革命。但这一超越，绝非像广松涉所宣称的那样彻底地、无条件地消解了实体主义。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是彻底地指出了：“不是用物质或意识作为本年来回答‘谁决定谁’，而是揭示‘物质与意识’这对范畴只有在实践之中才能获得具体的规定与关联；脱离实践，二者既无法比较，亦无法化约，更无法构成真正的因果关系。”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绝不承认有一种脱离了人类实际劳作过程的、作为抽象先验网格而存在的“关系”。“关系”不是凭空编织出来的，更不是逻辑自我推演的结构。在马克思那里，关系是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具体的、感性的“物质生产劳动”中被生产出来的。如果脱离了实践的动力学，脱离了劳动主体为了肉身存活而展开的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与能量代谢，那么所谓的“社会关系”就会失去其历史的、具体的、感性的肉身，退化为虚无缥缈的观念符号。

广松涉的理论恰恰陷入了这种“去实践化”的虚妄之中。他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的、带有鲜血与汗水的生产实践，强行将“关系”逻辑地拔高，使其成为了脱离感性物质始基的抽象物。在广松涉的“四肢因合”与“事态契机”理论中，物的世界被还原为一种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显现出来的“事态”，关系似乎成了不依赖于客观生产力、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物理自然约束而自我运转的神圣结构。

进一步地讲，广松涉虽然极其敏锐地注意到了“关系”对于超越近代形而上学实体论的重要性，但他却错误地将“关系”当成了这一切的核心，进而彻底忽视了“实践”作为历史原动力的终极本体地位，但实际上关系只能作为观察的样本，它重要但不核心，关键但不决定。这使得他的理论变成了一种缺乏历史重力的关系结构主义。他无法回答：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在历史中发生质变和革命的？如果关系是一切的始基，那么推动关系发生平移、断裂与升维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在马克思那里，这一力量清晰明确，那就是作为第一本体的、能动地重构客观世界的“革命的实践”（revolutionary practice）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在广松涉这里，由于“实践”被边缘化和消极处理，历史的能动性和阶级的实际斗争退隐了，取而代之的是纯粹知识论、现象学意义上的“世界图像的重组”。

因此，如果说广松涉在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从近代机械主义的“实体拜物教”中拯救出来，那么，他的这种“去实践化”重构，也只不过是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从一个深渊替换到了另一个深渊之中。这后一个深渊，就是将鲜活的、具有阶级压迫和肉体强迫性的、生产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窄化为一种精致的、学院化的、脱离了感性物质始基与劳动实践的“关系主义玄学”。

我们必须在此清晰地划定本著作的理论底线与红线：我们主张的“关系唯物主义”，必须以“实践”为唯一的第一本体。我们绝不否认关系的基础性，但我们坚持认为，任何社会关系（无论是物的（生产性）关系还是观念性关系）都必须在“实践”的母体中孕育和生成。正因为有了实践这一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我们才得以在承认客观自然界（感性物质始基）作为硬约束的前提下，宣称“物的（生产性）关系”通过对人肉身生存权的控制，直接格式化“观念性关系”。广松涉的“关系主义”由于丢掉了“实践”，最终滑向了否定客观实体、否定客观生产力硬约束的结构主义唯心倾向；而我们则始终站在“实践本原——物质中介——间接决定”的坚实地平线上。这就是我们与日本关系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划定理论边界时，不可逾越的红线。

“物质决定意识”还是“生活决定意识”？这场争论的实质，从来不在于两个概念的胜负，而在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究竟是什么？

本文的回答是：只有人，也只有人的实践，才撑得起这个核心。

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质，不是孤悬于空中的意识，而是活生生的人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构成了历史的真正地基。人的肉身要存活，人的劳动要被组织，人的观念要被规训——这一切，都发生在人的实践中，发生在人与人、人与物的感性实践中。离开这个地平线，任何“决定”都是空话。

实践性关系唯物主义所做的，无非是把这个再朴素不过的道理还给了唯物主义：历史的主角不是物，是人；但这个人，不是在观念中想象自己的人，而是在生产性关系中不得不活下去、不得不思考、不得不斗争的人。

这，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

## 引用

【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2】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

版, 第 89 页。

【5】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载《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13 页。

【6】 广松涉:《唯物史观的原像》, 张一兵编, 邓习议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3 页。

【7】张皓翔. 《要素的枷锁》[EB/OL]. Zenodo, 2026.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753290>